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基础和路径

安礼伟 张二震[1]

【摘 要】：低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减弱和外需下降使得中国传统开放型经济发展动能逐步消失，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中国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逐步显现，国内市场消费升级带来的对高质量产品的巨大潜在需求以及信息通讯产业较为完整价值链的存在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现实基础。新旧动能转换的方向是投入高技能劳动力，形成在高质量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以此解决生产方式和要素禀赋以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要从本质上把握新旧动能转换，不能将新旧动能转换理解成新旧产业转换。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重视企业微观竞争力的塑造，重视中小企业在创新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也要重视通过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整合全球优势要素形成企业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 劳动力结构 消费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82(2021)01-0009-07

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 1992 年之后开始进入稳定高速发展阶段，一直持续到 2007 年，此后开始进入经济增长减速期。2008 年之后开始的经济减速主要不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表现，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减速既与国际因素和外部冲击有关，更是国内结构性因素发展变化使然(李扬和张晓晶，2015)，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是一种“实质性的转型升级”(张慧芳，2015)，是经济格局重构和增长方式嬗变(汤铎铎等，2019)。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首先需要把握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事实，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分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任保平，2015)，因为要素禀赋状况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最重要基础，从初级要素主导向高级要素主导的要素禀赋变化才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张永恒等，2016)。

能否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甚至关系到中国会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诸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促转型政策被提出，理解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基础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具有深刻的内外部背景，而“变化”是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中国的要素禀赋特征在变化，市场条件在变化，产业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变化，理解这些变化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变化既是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的原因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 3 个阶段

[1]**作者简介**：安礼伟，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南京 210093)，南通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南通 226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我国高质量汇聚全球资源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编号:19BJL127)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前提是理解“旧动能”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消失了。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从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上述问题,为此图 1 描述了 1978-2019 年中国 GDP 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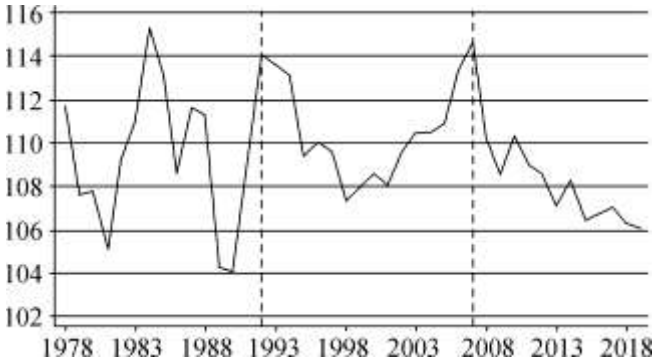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 GDP 增长率(1978-2019;上年=100)

资料来源:1978-2018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9》,2019 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 3 个阶段,1978-1991 年(第一阶段)、1992-2007 年(第二阶段)以及 2008 年之后(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经济平均增速较高,但是波动较大,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制度红利”阶段;第二阶段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高速增长,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经济增速放缓,但最低增速也达到了 7.3%(1998 年),该阶段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发挥,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人口红利”阶段;第三阶段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阶段。

2.1992 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的原因

理解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需要重点分析中国经济在第二阶段快速增长的基础和模式。要素禀赋尤其是劳动力禀赋特征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理解 1992 年开始的高速增长的来源首先要分析当时的要素禀赋状况,主要是劳动力禀赋特征。1992 年前后中国劳动力禀赋特征可以概括为存在大量剩余的低技能劳动力。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1990 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高达 60%,同时 1990 年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只有 326 人,1990 年之前每年均低于 200 人,1990 年人口普查显示每十万人口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数也只有 1422 人。[1]所以,从劳动力数量上看,大量潜在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既是负担也是潜在优势,将其从人口负担转变成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从劳动力结构上看,人口优势主要体现在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低技能劳动力上,这就决定了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大量投入低技能劳动力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种产品的技术含量主要由其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特征决定,具体来看,如果一种产品生产过程中主要投入低技能劳动力,那么该种产品必然是低技术产品,反过来如果是主要投入高技能劳动力,则属于高技术产品。1992 年前后中国潜在优势产业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使得人口红利的实现存在困难,因为这些产业需求收入弹性较低,世界经济的发展难以形成显著上升的市场需求。当时的劳动力结构特征和技术特征也使得中国难以通过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或者中高端市场提升市场需求从而实现人口红利。

1992 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与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密切相关。1992 年之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成功利用了国际分工模式转变带来的机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网络快速发展是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趋势之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种最终产品被分解为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然后按照不同环节不同要素投入特征被配置到具有相应要素禀赋优势的地区。显著的低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以信息通信(ICT)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

环节的重要配置地,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缺乏 ICT 产业基础,生产节点的构建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由外资企业完成。图 2 显示了中国实际利用 FDI 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从 1992 年开始 FDI 加速流入中国。FDI 进入中国的最主要动机就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配置劳动密集型环节以降低生产成本。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中国在尚未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得以进入新产业和新市场,为低技能劳动力红利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1990 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只有 335 万人,1993 年增长到 6200 万人,2004 年则达到 1.18 亿人,2007 年约为 2.1 亿人。[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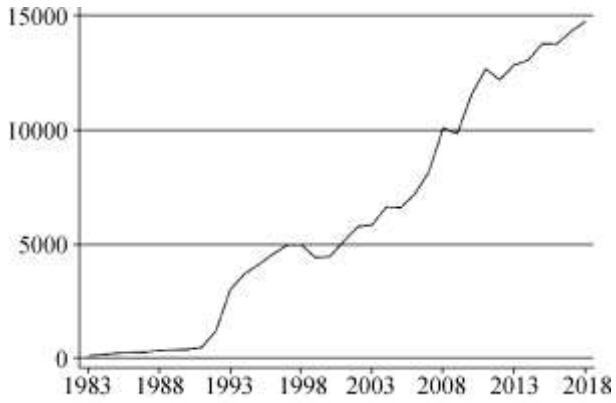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变化趋势(1983-2018 年,1983=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中国人口红利实现带来了机遇,从而开启了自 1992 年开始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帮助中国构建起了 ICT 产业较为完整的国内价值链,这些价值链环节起初主要由外资企业构建,本土企业通过为外资企业代工等方式也逐步进入 ICT 产业价值链。融入 ICT 全球产业链使得中国迅速成为 ICT 产业主要出口国,图 3 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 ICT 产业出口开始出现加速增长趋势,2000 年之后增长尤其显著。中国 ICT 产业出口增加表明了中国在该产业全球生产中的地位。ICT 产业较为完整价值链的构建意义重大,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电子商务、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都与此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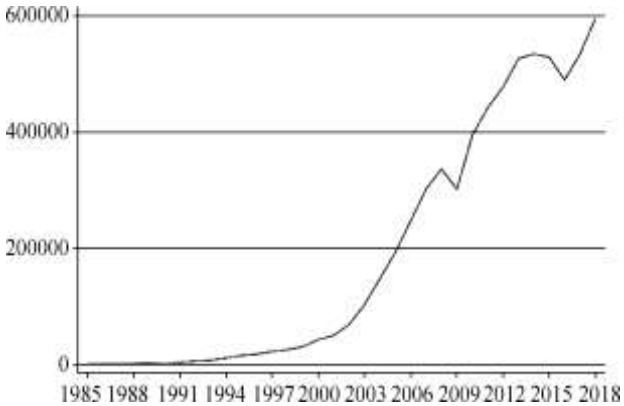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 ICT 产业出口变化趋势(1985-2018 年,1985=100)

注:对应于 SITC 分类 75、76 和 77 三个代码。资料来源:UNComtrade。

3.2008 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的原因

理解中国经济开始于 1992 年的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 2008 年开始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2007 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减速的外在诱发因素,根本原因在于推动中国经济 1992-2007 年持续增长的传统模式逐步失去动能。传统模式能够顺利运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中国拥有大量廉价低技能劳动力。只有具备这个条件才能维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区位优势并获取人口红利;其次是存在足够大的外部需求,因为存在足够大的外部对于最终产品的需求才能派生出在中国加工组装的需求。2008 年之后这两个前提条件逐步消失。从劳动力看,1992 年开始的外资快速流入和经济快速增长使得剩余低技能劳动力基本实现充分就业,未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低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逐步消失将是趋势。这是因为,首先从第一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已经较小;其次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出生率下降将是基本趋势。从外部需求看,ICT 产业市场需求增速也可能出现下降,因为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ICT 产业一定程度上经历的是“从无到有”的增量调整阶段,市场需求增长迅速,为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支撑,而 2008 年之后更多地将是存量调整,需求增速也将下降。

所以,中国经济 2008 年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减速现象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之痛,根本原因在于支撑之前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的前提条件逐步消失,而且前提条件的消失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依靠新旧动能转换,另一方面也印证和预示着中国经济减速的问题难以短期解决,因为新旧动能转换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回答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以及转换的方向是什么,需要对目前中国经济基本特征进行分析。

三、中国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基础与方向

要素条件和市场条件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这两个方面比较流行的看法有两个,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其次是中国内需不足并导致经济衰退。这两种观点从静态角度看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如果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就难以为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找到方向。

1.劳动力禀赋结构的变化与新旧动能转换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工资水平上升趋势明显,以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例,2000 年为 9371 元,2008 年和 2018 年则分别达到 29229 元和 84744 元。[3]这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看起来已经丧失优势,因此产生了中国在世界生产体系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会被取代的担忧。对此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确使得中国对全球价值链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吸引力下降,包括出现一些生产环节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认为这种趋势将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观点也是不准确的,仅从客观事实来看,中国工资水平尽管提升较快,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工资水平仍然较低,按照这种逻辑,发达经济体在制造业上依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象就难以解释。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有两个来源:第一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在完全竞争假定下,实际工资就等于劳动力边际产出;第二是劳动力结构改变,工资水平较高的高技能劳动力比重提升将带来平均工资水平上升。未来人均资本存量上升带来劳动生产率上升将是趋势,所以工资水平上升也是趋势。应该说,工资水平上升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不应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果工资水平提高仅仅是生产率提升的结果,那么工资水平提高就不会显著影响生产成本。中国工资水平提高应该是两个来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迅速提高,表 1 显示了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从全国范围看,这一比重从 1990 年 1.4%上升到 2018 年 14%,2018 年比重是 1990 年的约 10 倍。从高等教育毕业人数看,1990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仅仅为 61.4 万人,2005 年和 2018 年则分别达到 306.8 万人和 753.3 万人,其中研究生毕业人数 1990 年只有 3.5 万人,2005 年和 2018 年则分别达到约 19 万人和 60.4 万人。[4]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劳动力规模重要,但是劳动力结构对于产业结构而言更加重要。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将这些年劳动力成本上升简单说成人口红利消失不利于揭示本质变化,准确地说,中国低技能劳动力的禀赋优势有逐步削弱的趋势,而高技能劳动力的禀赋优势正逐步显现。正如罗伯津斯基定理

(Rybczynski Theorem)表明的那样,要素禀赋变化将导致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结构变化是要素禀赋变化的重要方面,也将导致产业和产品结构变化,这暗含着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将从大量使用低端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成本竞争型产品逐步转向大量投入高技能劳动的高质量产品。目前正处于劳动力禀赋结构变化带来生产方式和产业转型过程中,由于转型没有完成,就必然存在生产方式和变化后的劳动力禀赋结构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劳动力结构上禀赋优势逐步从低技能劳动力转向高技能劳动力,但是生产方式上还是以投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这才是产生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企业成本上升进而竞争力下降的本质原因,“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存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外在表现。

表 1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重(单位:%)

年份	全国	江苏	上海	浙江	广东
1990	1.42	1.47	6.53	1.17	1.34
2000	3.61	3.92	10.94	3.19	3.56
2005	5.56	6.80	17.84	5.42	5.81
2010	8.93	10.82	21.95	9.33	8.21
2015	13.33	16.42	28.70	14.66	11.99
2018	14.01	14.92	31.70	15.89	12.41

表 1 还显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就是江苏、浙江和广东这三个开放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的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和全国水平的对比,江苏和浙江只是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建立在低技能劳动力红利实现的基础上,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

2.需求结构变化与新旧动能转换

内需不足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是常见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政策含义就是要通过刺激内需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关于内需是否充足,宏观证据和微观现象经常产生不一致的现象,比如宏观上内需总体不足但是中国人对特定产品(主要是高档商品)或者特定情境下(比如出境旅游)却具有较强的购买力。理解这种现象需要认识到消费者收入水平提升不仅影响其消费商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影响其消费商品的结构。收入水平提升对不同类型商品的需求影响是不同的,高档商品需求上升而低档商品需求反而可能下降,这意味着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或者称为消费升级。所以,对于内需问题一方面要从结构角度去看待,未来随着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可以预期对于低质量的低档商品的需求会下降,而对高质量的高档商品的需求会上升,消费者有意愿并有能力为更高质量的产品进行支付,这种质量溢价具有转化为市场收益的条件(程虹等,2016),因此泛泛而谈内需不足可能掩盖需求变化的结构性特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内需不足从本质上主要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当前制约中国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突出问题是,未形成一个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匹配的精益制造生态体系(张杰,2016),这里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矛盾,表现为供给优势还体现在成本竞争型低档商品上,而需求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升级趋势。换个角度看,消费升级也为生产领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支撑条件,高端消费与其说是消费的增长点,不如说是供给的新动能(洪银兴,2018)。

3.新旧动能转换的基本方向

总结起来看,目前经济发展面临两个结构性矛盾,第一是生产方式和要素禀赋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未能及时体现劳动力禀

赋结构的变化;第二是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矛盾,供给结构未能及时体现需求结构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方向应该是通过解决这两个结构性矛盾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从劳动力禀赋结构特征和市场需求特征来看,未来需要实现从依靠低技能劳动力优势构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力向依靠高技能劳动力优势构建在高技术高质量产品上的竞争力转变,而且国内消费升级带来的对高质量产品巨大的潜在需求也为此提供了需求支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具有坚实的要素基础和市场基础,中国经济顺利转型后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是可预期的。在这两个结构性矛盾中,生产方式和要素禀赋的结构性矛盾是本质矛盾,该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缺乏诸如研发、品牌和营销等战略性资产,使得企业没有能力使用高技能劳动力投入形成在高质量产品上的竞争力。所以,解决该问题要依靠企业战略性资产的逐步积累,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创新就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政策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应该是提升供给质量,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对特定产业发展而言,基本条件包括产业基础、要素基础和市场基础,以此看来中国已经具备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国具备了信息通讯产业非常完整的国内价值链,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产业基础;高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撑;国内消费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基础。所以,中国经济尽管可能在一个较长时期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痛苦期,但是从长期来看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

四、新旧动能转换与实现路径的思考

为了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成为基本要求和趋势,不仅对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或者地区而言如此,对于微观主体企业而言也是如此。但是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也存在显著的认识误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将新旧动能转换理解成新旧产业转换,因此也将转型等同于转行。

1.不能将新旧动能转换理解成新旧产业转换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普遍共识是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这将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是政府政策的重要趋势。比如 2018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同意设立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尽管新旧动能转换被广泛讨论,但似乎对于新动能是什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从实践中看,新旧动能转换容易被形式化地理解为新旧产业转换,比如各地政府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出的重点发展产业几乎都是聚焦于诸如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等所谓新兴产业。

当然不否认这类产业的发展是需要建立在“新动能”基础之上并且体现新动能的,但是将“新动能”等同于“新产业”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产业技术含量的判断犯了“望名生义”的错误,也就是从产业名称判断一个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或者旧动能产业还是新动能产业。这种判断显然过于简单化,在认识上是有偏误的,应该说信息通讯产业也有低技术产品或者生产环节,纺织服装产业也有高科技产品或者环节,不能将传统产业统统归于旧动能或者低技术产业。对于新旧动能要从本质上加以把握,从本质上看“动能”指的是支撑产业或者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或者从国际竞争角度看是一国经济和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个动力源可以是不同产业竞争优势的共同基础。比如,强调创新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重要性,其含义应该不仅指向所谓的新产业,同样重要的是要依靠创新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其次,认识上的偏误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偏差,对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片面理解很可能导致产业发展“鄙视链”的产生,这种鄙视链可能体现在政府的产业政策上或者金融业贷款导向上,这种导向显然不利于传统产业通过转型升级重塑竞争力。所以,新动能不仅体现于新产业之中,传统产业也蕴含着创新的潜力和新动能。实践中将转型理解为转行是不准确的,将现有产品或产业做得更好是转型的应有之义。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引导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和“做强做大新兴产业”不可偏废,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新动能是相对于旧动能而言的,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看,旧动能是传统模式中依靠密集投入低技能劳动力形成的低成本生产优势,通过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低技能劳动力红利;结合中国要素条件和市场条件的变化,新动能应该是依靠技术进步,形成

密集投入高技能劳动力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构建中国在高质量产品上的国际竞争优势,同时国内市场消费升级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强大的国内市场支撑。应该说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产品,赋以新动能,传统产业一样可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面临如何选择主导产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以及重塑区域竞争力的问题,理解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含义就是要避免片面追求所谓“新兴产业”培育而忽视对有产业基础的现有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视和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有新旧之分的是产品而非产业,很多新产业本质上就是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所以对于地方发展而言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对具有产业基础的现有产业的现代化改造。对于地方政府或者特定企业,认为现有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往往是其放弃现有产业而寻求进入新产业的主要原因。在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该产业就是属于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第二种情形就是该产业可以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只是该地区(企业)目前处于该产业的低端。事实上,现实的情形主要是第二种,那么合乎逻辑的对策是提升现有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也就是赋予传统产业以新动能。因此,在新动能的定位方面,应强调新技术对传统行业的改造,提高经济效率,不应过度依赖新兴行业的产生(刘凤良和章潇萌,2016)。

将劳动力投入特征作为判断企业技术含量的主要指标有利于科学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推动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方向,因此高新技术企业也必然会继续受到政策上的照顾。因此,如何判断一家企业是否是高新技术企业将是决定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归根到底由其投入的劳动力技术水平决定,具体来说就是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如果其生产过程主要使用低技能劳动力,那只能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低端产品或者低端环节;相反,在传统产业中,如果企业主要使用高技能劳动力进行生产,其也是高新技术产品。以劳动力投入特征作为判断企业技术含量的主要指标具有有效性、简便性和客观性的优点。有效性包括三个含义:第一,以此为标准符合判断企业产出技术含量高低本质规定性;第二,以此为标准有利于增加企业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和高端人才的集聚,从而从根本上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三,以此为标准可以避免对传统产业的歧视,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简便性和客观性指的是该指标统计口径清楚,数据易得而且具有可比性。

2.重视企业微观竞争力的培育

在传统发展模式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建立在宏观层面的竞争优势之上,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禀赋优势,而这种优势为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共享,事实上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节点具有显著的外资嵌入型特征,表现为外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主体。未来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国际竞争力重塑的方向是从发挥基于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人口红利转向实现基于高质量劳动力优势的人才红利,但是劳动力禀赋优势的结构提升能否转化为供给结构的提升的关键在于企业微观能力的形成,因为一方面投入高技能劳动力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前提是企业具备技术和研发基础,离开这个基础,高技能劳动力优势就难以发挥作用,企业也就会缺乏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拥有品牌和营销等能力以实现高质量产品的潜在价值。因此,未来宏观政策的重心应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方向。

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中小企业发展,认为中小企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就业、税收或者产出等方面低估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意义。中小企业在激发创新活力,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革命性技术要么首先出现在中小企业中,要么由中小企业率先产业化,因为大企业在这方面存在劣势。大企业受制于大规模专用性固定资产和(或)大规模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制约,其创新方向往往是将现有产品做得更好,而非实现革命性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因为这意味着其将面临专用性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巨大损失。有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对于技术进步的新产品动能变化有抑制作用,同时企业规模对新产品占比的增长有抑制作用(张海洋和金则杨,2017)。中小企业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由于没有大规模专用性固定资产和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约束,其更可能将资本和有前途的高新技术相结合,实现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从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转向创新发展阶段。在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大企业有优势;而在创新发展阶段,中小企业有独特的作用。离开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创新活力就难以充分释放,因此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不是中国目前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未来政策的基本趋势。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平市场准入的机会;第二是为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提供必要支撑条件,只有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能够成长壮大才能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有效力量;第三是为中小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提供平台条件,中小企业在研发方面和整合资源能力上

较大企业弱,因此搭建新技术和资本相结合的有效平台对于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非常重要。

3.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更加需要开放型世界经济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成为全球生产网络最为重要的加工组装地,并因此充分实现了基于低技能劳动力禀赋优势的人口红利。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也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这个方面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逆经济全球化”是否是未来的基本趋势;第二个是中国未来为什么更加需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由美国挑起的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引发了“逆经济全球化”的担忧,尽管可以预期贸易摩擦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但是“逆经济全球化”不会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这需要从贸易摩擦的本质出发加以理解。贸易摩擦只是世界经济规则重塑需求的外在表象,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世界经济处于规则重塑期是大变局的主要体现,贸易摩擦频繁不过是规则重塑期各利益相关经济体规则制定权博弈的外在表现。从这个角度看,贸易摩擦必将带来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但是其结果不会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根本逆转。经济全球化存在坚实的微观基础,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下,整合全球不同区位优势资源是企业塑造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内生需求,国际经济规则博弈带来的贸易摩擦不会根本改变这种内生需求。可以预期,尽管贸易摩擦不会在短期解决,但是国际经济规则重塑完成后,经济全球化必将进一步深入发展。

中国未来新旧动能转换也离不开融入开放型世界经济。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从“引进来”角度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成功与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融入开放型经济有效实现了低技能劳动力红利和提升了产业结构。未来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也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完成,同样需要积极利用高新技术 FDI,通过外资企业进入的前后向联系效应推动本土企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本土企业竞争力;同时也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高新技术产业市场准入带来的竞争效应,推动本土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其次,从“走出去”角度看,未来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由要素被整合者转向全球不同区位优势要素的整合者,包括通过“走出去”整合发达经济体的战略性资产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更为廉价的要素,从而形成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于全球市场。

当然,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趋势,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未来不重视“国际循环”,二者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内大循环的顺畅也有利于更好参与和利用国际循环提升产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从微观角度看,企业在国内市场的成功也有助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为充分利用升级后的巨大潜在市场促进企业发展,不仅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而且能够得到金融市场有利的融资条件,这些都有利于企业国际市场的成功。同时,国内市场的成功还能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的波动,而未来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

参考文献:

[1].程虹、刘三江、罗连发:《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基于 570 家企业 4794 名员工入企调查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2016 年第 2 期。

[2].洪银兴:《培育新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经济科学》2018 年第 3 期。

[3].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 年第 5 期。

[4].刘凤良、章潇萌:《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动能切换与结构转型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5].任保平:《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经济学家》2015 年第 5 期。

[6].汤铎铎、刘磊、张莹:《长期停滞还是金融周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 10 期。

[7].张慧芳:《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再平衡与新期待》,《经济学家》2015 年第 7 期。

[8].张永恒、郝寿义、杨兰桥:《要素禀赋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学家》2016 年第 10 期。

[9].张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障碍、困局与改革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10].张海洋、金则杨:《中国工业 TFP 的新产品动能变化研究》,《经济研究》2017 年第 9 期。

注释:

1 国家统计局网站。

2 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数据平台。

3 国家统计局网站。

4 国家统计局网站。